

纪念

赵昌平的唐诗研究

陈尚君

我推测,《唐诗三百首新编》的注评几乎全部为昌平所执笔,马茂元先生增订本《唐诗选》中的总评为昌平写出,更合适的理解是马先生的晚年见解,由昌平整理写定,这部分可以看作唐诗研究马赵学派的共同成果。前述两书中有关诗人及名篇的解说,恰可作为师生二人接力而终未完成的唐诗史来体会。

2018年5月20日晚,在研究室将影宋蜀刻本柳宗元诗与大抵写定的新定唐诗中的柳诗对校。柳诗中的寂寞悲凉,强烈地冲击着我。次日早晨,得悉昌平兄遽然辞世,且就在我悲动五内之际。昌平曾说柳诗“有时他的抒情,则以奔迸出之,长歌当哭,发为凄厉激越的变徵之音”,这次深切体会到了。

昌平长我七岁,读研晚我一年,因以平辈视我,我也直呼其名。第一次听到他,是1984年11月在松柏饭店举办中日《文心雕龙》会间,偶有机缘听到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先生的谈话。钱先生感谢师大将赵昌平这么优秀的学生交给古籍出版社;徐先生则说师大也很希望赵留校工作,他是上海人,为让有家庭负担的外地女生留校,主动放弃留校,愿到出版社工作。我因此而知道了昌平学问之优异,为人之大度。

第二年,在出版社经李梦生兄介绍,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常共同参加会议,阅读彼此的论文,私人间的来往也很多。他是重友情、讲原则的人,友谊归友谊,学问归学问。他在出版社很忙,但我学校这边的事情,凡有所求,绝不推辞。会议准备充分,答辩一丝不苟。学位论文请到他,都看得很认真,在提交结论意见外,还会附上大量发现问题的具体记录,供学生修改。对好的论文不掩饰喜悦之意。我与他都参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逐渐成为学会的核心成员,他的识见大器在圈内早有口皆碑。

与昌平交往频繁,可写的内容很多,他的成就与人生是立体而多元的,我之所知,仅是他经常展示的一个方面。我想仅选取一个方面来写,即昌平的唐诗研究成就及其唐诗史写作构想,因为这是他留给当代学术的最宝贵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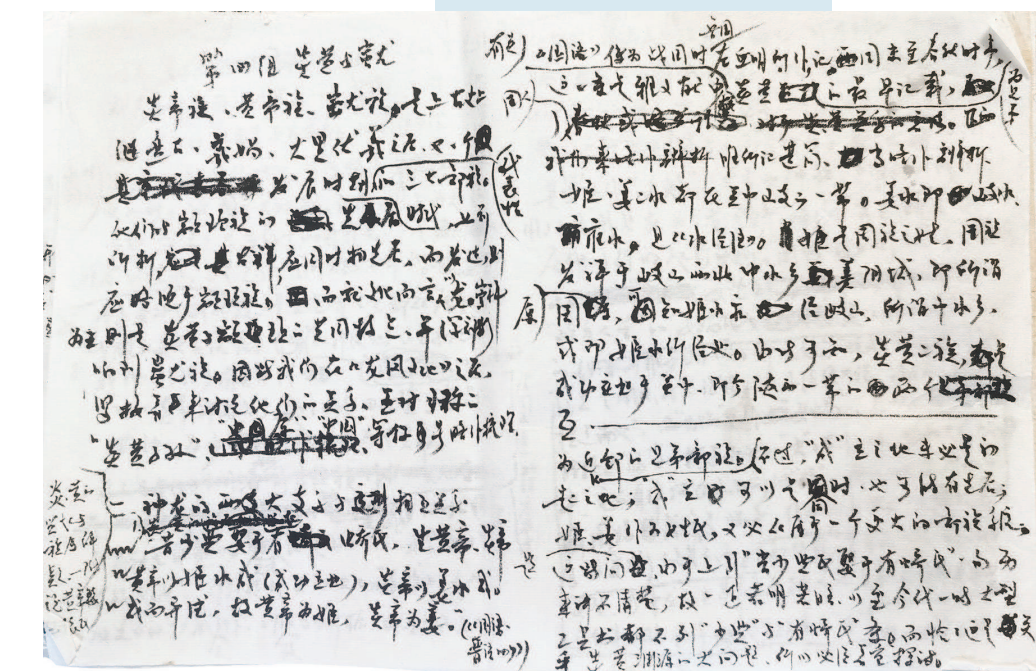
就

昌平本人的求学经历来说,有三段特别应该说起。一是他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经历,至少有两年完整的修读经历,那时恰是北大中文历史上最强的时期,这段学习奠定他一生的学业基础。二是在华东师大随钱伯城先生攻读文学硕士学位。钱先生是新文学名家,中年后治学涉猎金石、诗词诸多领域,视野阔通,见解精辟,在文学阐述中每能以特殊的文献和精密之考订而独辟新境。昌平从学期间,完成学位论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不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引起学界广泛的关注。他从纵、横两个不同视角,揭示盛唐到中唐两个顶峰时期之间,以皎然、顾况为首的一批吴中诗人,在汲取民间谣曲滋养和承变南朝诗体基础上,开始新变的努力。他认为,这些新变既带有大历时代的痕迹,又显示元和诗风的种种先兆,是两大高峰间诗风转变的枢纽。吴中诗派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他从地域时代、性格地位及团体活动加以论证,揭出核心成员七人,从对皎然《诗式》的考察,揭示此一诗派复古通变的理论立场,以及不主故常、惊世骇俗、以谐谑为奇崛的诗格追求,进而从题材、音节、风格及俗体联句四方面,论述此派之诗歌成就,确认其具有上承鲍谢、下启元和诗变的历史地位。我在此论文发表初就曾阅读,理解在当时学术环境中,文学史研究要摆脱作家作品论与思想艺术分析已成共识,但方向在哪里,大多很迷茫,回归传统不免拘泥细节,追求新方法又不免空疏肤浅,此文当时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80年前后,国内唐代文学研究风气丕变,其中一路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关系之研究,尤以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之兼取法国社会学派之研究立场,而融汇陈寅恪、岑仲勉之唐史研究方法,对诗人生平与诗歌真伪本事展开探索,成就突出。昌平也参与了与此相关的大量工作,本书所收“诗人考论”部分多数论文,都是在此期间所作。除与同学合作之郑谷研究外,他的重心仍在吴中诸诗人生平真相之追究。

然而昌平的主体研究,并不局限于此。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而有影响的论文,是《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初唐七古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等一批力作。因为对这些论文,到1990年前后,他虽然还没有专著,已被国内前辈学者推许为唐诗研究最具潜力的青年学者。

1990年11月,在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唐代文学研讨会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两位主事者约他撰写分体断代文学史系列著作中的《唐诗史》一



赵昌平《开元诗地》“炎黄与蚩尤”部分手稿

书,特在夫子庙奎星阁设宴与他确定选题,邀我与董乃斌兄作陪。席间,得机缘听昌平对《唐诗史》写作的设想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他不赞成以时序叙述唐诗发展过程的框架,更不赞成写成作家作品论,也不赞同写成文学社会学,坚定地认为唐诗发展有其内在逻辑,个人命运、社会变动及作者取径虽有各自的不同,决定因素是诗歌本身的生命力。他特别强调体式、气韵、意象、意脉等诗歌内在因素所能展示的唐诗发展史。他的说法当时就给我以截断众流、独辟康庄的印象,非常希望他能尽快完成全书,每见面时多有询问。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如1990年悼念马茂元先生文、2016年悼念傅璇琮先生文,都说到要完成此书,以不负二位前辈的嘱托,偶也说到已经成文若干万字,但在公私困扰下,最终没有完成这部学界期盼甚殷的著作,实在非常遗憾。

尽管如此,就我之认识,他写过的系列论文已经具备了唐诗史的基本框架,而他自著及协助马茂元先生完成的多种唐诗选本,也具备此一方面的意义。在此要特别说到的第三段求学经历,即他与马先生遇到、从师到担任助手,合作新著、整理遗著的过程。

昌平早年读过马先生的几种选本,心存感佩。1982年论文答辩有机缘拜识,此后到1989年末马先生辞世的七年多时间里,他几乎每周都去马家同学请教,师生之谊超越了学籍与同事的名分。马先生是清季桐城文章大师马通伯之孙,早承家学,尤重诗文记诵,在记诵中理解诗文的技巧、音节与理脉,在广泛记诵中增加诗歌艺术的体味。马著《唐诗选》初版甫出,即传赞士林。马先生一直希望写出一部唐诗史,且希望在会通与识见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所谓会通,不仅是对唐诗的全面阅读与理解,还应包括唐前唐后各代诗歌之体认,为唐诗就有清晰定位;综括历代对唐诗之评论,从而认识唐诗精妙卓越之所在。他将唐诗史的写作,视为包含作家考订、文本研究和理论阐发三者结合的系统工程。如果岁月安好,马先生的工作可以有序展开。他的起始工作是两《唐书·文苑传》和《唐才子传》笺订,已经完成数十万字,但风波遽起,文稿、札记均告焚劫,从少数遗稿看,他的理路与八十年代以后傅璇琮先生倡导的工作,精神是相通的。昌平向马先生请教期间,马先生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以往的目标很难实现。就昌平的记录看,师生间谈得最多的是马著《唐诗选》的增订,以及《唐诗三百首新编》之选目,其间大量涉及唐代具体诗人的评价与诗作之分析。昌平概述马先生治唐诗的理论体系,用了“通变与不困”一语,将文学史看成“文律”辩证发展的生动过程,将重情志、重气势、明章法作为个人治学的特色。

昌平为马先生身后遗著的整理出版作了大量常人难以设想的工作。最主要的著作是《唐诗选》。此书初版于1960年,到1985年后修订时,涉及入选诗人与具体篇目的调整,诗人小传的修订与增写、注释补订、增加总评部分,昌平协助完成全部工作。其中每诗后之总评,皆由昌平执笔,得到马先生认可。诗人小传,则吸取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新成果。篇目调整,则马先生初定四百多篇,昌平再提出百多篇,得到马先生认可。2018年春,我在为此书作介绍时说道:“本书最后定稿于马先生缠绵病榻之时,赵昌



平承遗意,投入很大精力完成遗著的写定,最后出版时退隐而不署名。据我所知,此书可以视为两代唐诗学者的学术结晶,也可以见到老辈学统和道德的继承发扬。”昌平回应:“评价得得体,马本主要还是自己之力。”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则短讯。

《唐诗三百首新编》初版于1992年,署名、赵选注。昌平曾回忆,她始协助工作时,马先生已经选定二百五十首,其余七八十首,则历时两月,经十数次讨论方定。清刘永济《唐诗三百首》是影响巨大的选本,但取径较窄,以课蒙为主,从现代学术视野看,显然有许多不足。马、赵《新编》的目标是“既要易懂易记,又要拓宽门径为初学者提供窥测唐诗发展概况之窗口”。马的选目是从几万首唐诗中反复遴选的结晶。昌平的工作则对刘永济生、《三百篇》成书与取资,作过充分考察。《新编》在时代、体裁、作者及诗艺诸方面,皆称当代选本之典范。更可贵的,是除注释简明准确,有关作者小传及诗风总评,及具体篇章的点评来说,都有很独到专诣的见解。如刘长卿“意境往往流于枯寂,风格也少变化”,说柳宗元诗“从幽峭掩抑的意境中,表现沉着深挚的感情,像巉岩峻谷中凛冽的潭水,冲沙激石,百折千回,流入绝涧,涟漪到彻底的澄清”,这些见解,披卷纷呈,非沉潜多年、反复吟诵者不办。我推测,《新编》的注评几乎全部为昌平所执笔,马先生增订本《唐诗选》中的总评为昌平写出,更合适的理解是马先生的晚年见解,由昌平整理写定,这部分可以看作唐诗研究马赵学派的共同成果。前述两书中有关诗人及名篇的解说,恰可作为师生二人接力而终未完成的唐诗史来体会。

当然,昌平设想中的唐诗史与他记述马先生构想的唐诗史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八十年代国内唐诗研究风气的转变,那一时期兴起的西学新潮及因此而引起的新方法、新思潮讨论,也是他所极度关心的。他努力试图在传统与新潮之间开拓一条新的道路。就我所知,新方法讨论最热闹时期,他并没有发表多少见解,而是踏踏实实做唐诗研究个案的论述。前引《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一文,考察重点是从四杰到李杜的百年间七言古体歌行内在的变化史,从与赋之关系、诗骚传统、骈散变化、任气排累,进而从句式声调、诗歌意象、布局取势诸方面揭示盛唐七古的巨大成就。《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风格溯源》则从《全唐诗》所存全部唐前期七律的统计与考证着手,对所有诗皆作系年与分析声律的基础上,说明从太宗至中宗间九次群体参与的七律唱和,逐渐合辙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群体选择,而合为七律蜕化于骈化的歌行,也足成一家之言。而《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一篇,则可说是他论述“吴中诗派”的前传,其中有关南禅诗宗兴起的分析,是一课题较早的论述。

1990年以后,昌平仍有一系列重

要论文刊布,在这里可以提到的有《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的形成与分期》《盛唐北地土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以及有关王维、李白及郑谷的系列论文。在新方法讨论热潮过后,昌平则发表多篇论文,试图从理论上阐述传统学术在当代应努力追求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有关唐诗人有《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意象、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有关文章者则有《文章学的思辨形态与理论架构——从〈文心雕龙〉到〈诗式〉》。

认识

昌平逾33年,许多方面都承他照顾提携,当有疏失时,他会在私下给以提醒。十年前,我因新编全唐诗遭遇不快,昌平嘱我不要太计较,鼓励我在精力尚有时可独立做出。2012年春与他同在京参加古籍规划会议,我让他看电脑中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当即表示可以接受出版。其后复就样稿讨论数次,他也两度来复旦参加课题论证。在他去世两年半后,我终于完成全书初稿,很可惜他已经看不到了。知音再无,是我特别伤感的。

昌平先生生前,中华书局曾约书稿《赵昌平文存》,在告别会后,征得各方友人与家属同意,将编纂《文存》的委托交给海南大学海滨教授。昌平先生在海内外发表论著数量巨大,目前尚无完整目录,他逝世后的存书与遗稿,至今仍未清理完成。他的诗作生前在友人间流传,也不知今后有无机会结果。凡此皆希望熟悉的朋友提供线索,补充遗选,期待今后有增补的机会。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论衡

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

熊月之

当今时代,人类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创新,鲜明地呈现以下四个特性:即知识更新快速性、知识总量无限性、信息发布随意性、知识真伪难辨性。

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人类知识三大版块,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就是数理天地生医农,文史哲经法社教,每一门学科下面不知道分出了多少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以历史学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国史、世界史,再细分,有古代、近代、现代、当代,还有城市、乡村、社会、区域,古代还可以按时段,先秦、秦汉、唐宋元明清,一直细分下去。据相关学者测算,人类知识在19世纪是每五十年增加一倍,20世纪初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到70年代是每五年增加一倍,而最近十年大约每三年增加一倍。

知识总量越来越巨大,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人类近三十年来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占有史以来科学知识总量的90%,换句话说,此前几千年中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只占现在科学知识总量的10%。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信息发布多样化、随意化,只要有手机,每个人都可以持续不断地发布各种信息。于是,信息世界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知识创新越来越依赖于两个基点,即对学科前沿最新知识的准确把握,与对学科宏大背景的全面把握。前者要求的是分析,后者要求的是综合,前者要求的是专,后者要求的是通。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完成知识创新。

面对这样的知识总量,这样细密的分工,这样快速的更新,这样混杂的局面,每个人都显得越来越渺小。但是,人类需要由准确知识汇集起来的无所不包的万宝全书。这就是百科全书与《辞海》一类以准确、宏通为特点的权威工具书。因为,知识无限,能力有限。一个能力有限的人在无限的知识海洋中有所创新,就必须依托无限的知识界的综合能力。于是,百科全书出现了,《辞海》出现了。“对不对,查《辞海》”,成为人们获得、验证知识的有效法门。

百科全书与《辞海》的共同特点,都是依托知识界的集体智慧,为社会大众提供可靠的、准确的、稳定的知识。任何知识创新,都是在知识守成与变异的矛盾中展开的,都是在知识体系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实现的。《辞海》每过十年就大修一次,有所保留,有所增删,有所修订,就是这种守成与变异的综合体现。

辞书讲究知识的全面性、科学性、稳定性。以知识体系相对稳定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最近四十多年,无论是具体史料的披露,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话语的更替,研究体系的变化,都是相当广泛而深刻的。每过十年就对这些变化作一遍梳理,对相关学者与社会大众来说,是提供了可靠的参考知识,对于从事《辞海》条目修订的学者来说,则是对学界动态一次新的了解、梳理与研究,也是一次综合性的学习与提高。从条目的修订与撰写过程中,也能折射出历史学界的演变与发展。在此前《辞海》修订过程中,陈泽先生和我负责近代史方面的内容。我们深感这一工作极有价值,也很有难度,但总是勉力为之。

从收词范围看,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辞海》所收政治性条目、阶级斗争类条目较多,经过这三四十年的不断修订,社会学、文化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的内容,增加了许多,也更能反映丰富的历史内涵。

释文方面,《辞海》注意吸收学

术界比较可靠的、稳定性较强的成果。比如,1900年7月,唐才常、容闳、严复等两次在上海举行旨在反对慈禧太后统治的“中国国会”,有八十多人参加,影响很大。会议举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有哪些人参加?言人殊。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称,会议是在张园举行的,因此,后人将其简称为“张园国会”。但是,根据参加会议的孙宝瑄的日记,以及与会的日本人记述,会议是在愚园举行的,地点、人数、议程均有具体记录,这些信息显然比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更为可靠。《辞海》中,多个条目提及这一事件,第五版之前的版本,释文均为“张园”,我们在修订时,便将“张园”逐一改为“愚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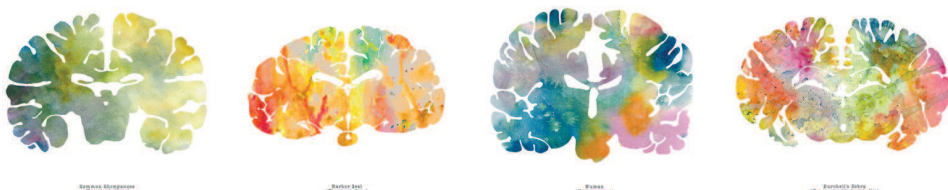
再如,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中,章太炎与邹容被捕。章太炎出狱后曾撰文,说他与邹容被捕是吴稚晖向清政府告密“献策”所致。吴奋起反驳,要他拿出证据、证人,章无法提供。后来,章在修改《邹容传》时,便将有关文字删去。蔡元培也认为吴稚晖说话,力辩其无。20世纪80年代初,唐振常先生发表文章,以过细的资料、严密的逻辑,论证“苏报案”中本无密可告,吴也没有告密其事。《辞海》第二版(1965年未定稿)和第三版“吴稚晖”条采用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称“1903年《苏报》被封,由于他(吴稚晖)的出卖,章(太炎)和邹容被捕”。1989年版(三卷本)修订时,便删除了这一说法。又如,秋瑾案中汤寿潜责任问题。《辞海》第二版和第三版“汤寿潜”条称“1907年(汤寿潜)参与浙江官绅杀害秋瑾事件”。引起争议。第四版删除了相关内容。但是,民间沿袭旧说,北方一电视剧演绎这一故事,称汤寿潜陷害秋瑾,引起诉讼。

古人强调史书在彰善惩恶方面的特别功能,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在信息记录、保存手段如此丰富,文字撰写与出版如此多元而发达的今天,一般史书的功能早已远远不能与《春秋》相比了,但是,作为在广大读者中有很高权威性的《辞海》,其收词、释文的影响,依然值得编撰者高度重视。正因如此,我们每次接到修订任务,总有如履薄冰之感,告诫自己认真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辞海》相关条目水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辞海》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

神经哲学“不是真的哲学”吗?

编译/黎文



多媒体艺术家 J. Sayuri 制作的动物大脑集锦

资料图片

帕特里夏·丘奇兰 (Patricia S. Churchland) 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哲学系教授,她的领域是神经哲学——神经科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在最近的著作《良心:道德直觉的起源》中,她指出良心是一种将社会规范内化的神经生物学能力,而人类如何以及为何区分对错的严格哲学意义形成鲜明对比。主流哲学界多认为神经哲学“不是真的哲学”,但丘奇兰说,在观察到她终身难忘的场景后,她已经爬出了“传统哲学的深井”。她坚信,要理解心灵,必须理解大脑的运作机制。日前,丘奇兰在科学网站 edge.org 上介绍了让她第一次深感震撼的时刻:“在我的第一堂神经解剖课上,

我们面前的病人是一位前医学院院长,他曾发生过一次小中风。当他开始确定中风的位置时,突然悲哀地抽泣起来。我们都担心极了,安静地等了很长一分钟,直到他突然停止抽泣。他并没有被这段插曲所困扰,而是平静地继续解释说,这是由于脑干的一小片区域被损伤了,当受到高水平的肾上腺素触发时,就会发生反射性的哭泣。有意识的控制是徒劳的。

“这是脑中风的常见后遗症,被称为假性球麻痹。更让我们困惑的是,他几乎像一个旁白一样,困自己在整场哭泣中丝毫没有感到悲伤,尽管他承认假性球麻痹的恼人。这是我在神经哲学的新世界里得到的第一个

结论:沮丧行为和沮丧情绪可以完全无关,这便是许多完全信任自己所思所想的哲学家口中不可思议、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它确实发生了,就在我们眼前。这是脑损伤患者展示一系列‘哲学上不可能’中的第一个。”

丘奇兰说,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们都对她的工作充满好奇,想从她这里知道,哲学家们是否认为存在一个非物质的灵魂,如果是,那又为什么存在。在解剖实验室里,一个人类的大脑确实实地送到了她的手上:“我用手托着她,对这个组织感到一种近乎虔诚的谦卑,它体现了某个人类个体的爱、知识与技能。而它看起来那么小,和它具有的复杂功能完全不相称。”